

从《分成两半的子爵》看信仰的困境

高瑞怡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分成两半的子爵》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经典之作,小说取材于宗教战争的历史典故,以寓言的形式展现了西方宗教衰落之后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文章运用尼采及伊格尔顿对西方宗教的论述,试图在神学思想中寻找卡尔维诺的智性话语,以探求现代人“分裂”的解决途径:分裂为两半的子爵暗含着基督教“善恶观”的艺术变形;追寻“完整”的宗旨预示着回归古老和谐的价值体系。这是一个现代派作家对于信仰困境的哲思,也是卡尔维诺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引领。

[关键词] 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信仰困境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5-0102-05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是意大利著名的小说家,在西方文坛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笔耕不辍四十余年,带给读者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创作中,卡尔维诺致力于小说艺术形式及创作技巧的探索,轻逸的语言、独特的想象力、寓言与童话的框架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新颖别致的风貌,同时小说背后隐含的多义性与复杂性展现了意蕴丰厚的文学内涵。翻译家吕同六先生曾经说过:“卡尔维诺从来不会对读者进行简单生硬的说教,他的作品有一种多义性。他的每部作品,你都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1]这种多义性使卡尔维诺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魅力,也带给读者阅读的惊喜与思想的养料。

《分成两半的子爵》是卡尔维诺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寓意深刻又充满现实意味的故事。17世纪末期,奥地利与土耳其之战,飘扬着为信仰而战的神圣口号,年轻的梅达尔多子爵不明就里,凭借一腔热情奔赴战场,却在战火中被大炮劈成两半。子爵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变为了两个半身人,一个专做坏事的恶人和一个只做善事的好人,好人与坏人同属梅达尔多子爵,却自我分裂、斗争,善与恶博弈,寓言与现实不断交织,深刻地表达了现代社会“宗教衰落”与“人的异化”。虽然小说主要运用意大利寓言

写成,但卡尔维诺作为一名西方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浸润了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基督教思想,也交织着对圣经典故的运用。本文旨在从“信仰困境”这一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以探索小说中基督教思想的表达,同时也为小说的多义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宗教衰落——现代西方社会的信仰困境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指出,宗教信仰是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统治方式,它通过意象、象征、习惯、仪式和神话,在人类的潜意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良好的社会粘合剂,宗教的终极真理拒绝了理性的证明,它是一种安抚力量,培养人们驯顺、牺牲和内省的精神。但自19世纪中后期,宗教已开始走向衰落,“它不再能赢得群众的心。在科学发现和社会变化的双重冲击下,它原先那无可怀疑的统治处于消亡的危险之中。”^{[2] 25}

早在1802年,青年黑格尔(G. W. F. Hegel)在《信仰与知识》的结尾处已断言:“新时代的宗教赖以建基的那种情感——就是:上帝本身死了……”^{[3] 768}继黑格尔之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1882年出版的《快乐的科学》中也高喊出“上帝死了”这句话,因其对基督教价值体系的

[收稿日期] 2017-07-20

[作者简介] 高瑞怡(1987—),女,云南开远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欧美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彻底批判,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尼采认为,“上帝死于他对世人的同情”^{[4]96-97},在见证了人类最为丑恶的行径之后,被人类所谋杀。传统文化假设中全能的“上帝”再也无法救赎人类,也无法干预和改变这个世界。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后,西方社会历经了战争创伤、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从前“上帝”承载的道德伦理彻底崩塌,人们在精神领域丧失了约束和指南,这种“信仰危机”直接指向了“人的危机”。海德格尔这样做出评价:“‘上帝死了’这句话包含着以下断言:这种虚无展开自身。‘虚无’在此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的不在场。虚无主义,‘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就要到来了。”^{[3]461}

卡尔维诺成长于独裁时期,在战争期间他又投身戎马,因而对于战后精神文明的毁灭有着极为深刻的感受。他曾在《我们的祖先》的“后记”中谈道,1951年开始写作《分成两半的子爵》时,他想要表达的是“那些年里的气氛”:“我们处于冷战中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它们不具有看得见的形象,可是主宰着我们的心灵。于是,当我写一个完全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时,我不仅在不自觉地宣泄那个特殊时期的压抑感……一个士兵的故事,发生于一场现代战争,但是常见的表现主义讽刺作品被反复炒腻了:一场远去时代的战争更好一些……奥地利—土耳其战争,17世纪末期,埃乌杰尼奥亲王……”^{[5]93}小说中的战后世界土地荒芜、瘟疫肆掠,一切都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人心也开始变得扭曲异化。这是“上帝死后”混沌沉滞、虚无荒诞的景象,也是现代人彷徨、失落、孤寂的心理写照。分裂的梅达尔多子爵让他的家乡泰拉尔巴充斥着压抑与恐惧,在那段不安的岁月里,人们企图用信仰来拯救内心的创伤,然而却化为泡影,陷入了精神荒芜的绝望之中。

正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写于雄伟的卡尔特寺院的诗章》中写道:“我们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则无力诞生。”^{[6]100}宗教缺失所带来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了当代社会,西方人为寻找上帝的替代品作出了无尽的尝试。伊格尔顿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中提出:“从启蒙理性到现代主义艺术,一系列现象承担了提供超验的替代形式的任务,以填补上帝曾经存在的空白”^{[7]ix},例如启蒙时代的“理性”、浪漫主义的“自然”、尼采的“超人”、19世纪至20世纪的“民族主义”等,它们只是承担了上帝的某种属性,却无法真正地取而代之。因而在尼采宣称“上帝已死”的百

余年间,上帝看似死去,却从未远离:“宗教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假定一些巧妙的伪装而生存下来,正如它也没有被世俗化所驱逐的那样。……全能的上帝已经被证明是难以取代的。”^{[7]ix}事实上,卡尔维诺在20世纪中期已开始思考“上帝死后”西方人的精神走向该何去何从,《分成两半的子爵》透露出“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伦理的描写”^{[5]95}:分裂为两半的子爵暗含着基督教“善恶观”的艺术变形;追寻“完整”的宗旨也预示着回归古老和谐的价值体系。从当今西方宗教热逐渐升温与批评界“神学转向”的背景来进行反观,这是一个现代派作家对于信仰困境的哲思,也是卡尔维诺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引领。

二、善恶对决——背离上帝与无望的救赎

被大炮轰成两半的梅达尔多子爵并没有死去,而是奇迹般地复活了。战争衍生罪恶,人类的善性被遗失,救回来的右半边便成为恶的聚集体。恶子爵先回到了泰拉尔巴,他气死父亲、驱逐乳母、杀死百姓,在他的统治下,没有公正、温情,只有杀戮与驱逐。当邪恶造成巨大的灾难与不幸后,人性善的一面逐渐复苏,子爵遗失的左半边化身“至善”也回到了泰拉尔巴,他对恶子爵犯下的罪孽十分愧疚,并尽可能地去弥补。善恶使子爵处于自我分裂的冲突之中,邪恶的一半,像魔鬼一样可怕;善良的一半,如同基督救世主一样乐善好施。据《圣经》中记载,人的先民走出伊甸园就知道了善恶,并世代相传。然而到了卡尔维诺笔下,梅达尔多子爵却变成了一个不知善恶的人,善恶二元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小说的开始,子爵虽然健全,但却:“还不懂得区别善恶是非,一切感情全都处于模糊的冲动状态。”^{[5]2}在惨遭分裂之后,恶子爵只作恶,善子爵只行善,不得完整。小说中通过恶子爵气死父亲展现了人与上帝的背离,也通过善子爵脆弱的善举表达了救赎的无望。善子爵与恶子爵犹如上帝与魔鬼的对立,将人心分裂,扩大,膨胀,以致走向极端,鲜活地展现了现代人心灵的残缺。

在恶子爵的故事中,卡尔维诺对阿约尔福老子爵的描写虽有些荒诞不羁,但只要细细品读,便能发觉其中的深意。鸟在老子爵短暂的出场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鸟的意象也尤为引人注目。事实上,这些鸟儿巧妙地反映出梅达尔多子爵的信仰困境与阿约尔福的宗教原型。在基督教中,鸟是圣灵的象征。诺斯诺普·弗莱(Northrop Frye)曾在《伟大的

代码——圣经与文学》中提到：“圣灵和上述两个意象联系在一起：和飞鸟，尤其是鸽子联系，和风联系，和闪电般的火焰联系……”^{[8]209} 诺亚方舟的故事里，鸽子便是上帝旨意的灵媒，当它衔来橄榄枝时，诺亚便知道大洪水已退去。《路加福音》记录耶稣受洗时，圣灵降于耶稣身上，鸟儿有着极其明显的隐喻：“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①那么，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嗜爱养鸟的老阿约尔福便有了圣父的影子。他放弃对世俗的眷恋，一心向往和鸟儿在一起的世界。老子爵住在鸟笼中的荒唐行为也有了解释：这是喧嚣尘世中的一方净土，是神圣的信仰所在。老子爵曾渴望儿子能主动走进鸟笼来看看他，然而却被断然拒绝，这象征着现代人信仰的困境，鸟笼将上帝与人隔绝开来，不得沟通。小伯劳是圣父对梅达尔多的又一次召唤：他降下圣灵，希望能够使自己的爱子从战争的罪恶中得到救赎。因而，恶子爵残杀鸟儿的行为则象征着他对于圣灵的冒犯和对信仰的背弃，既展现了人性之恶，也预示着人与信仰的彻底疏离。

当恶子爵让泰拉尔巴处于水深火热时，善子爵的回归预示着至恶之后人性善的复苏。善子爵身上确实有着基督救世主至善、仁爱、正义的道德品性：他行善施惠、关心穷人、同情弱者，哪里需要帮助，哪里就有他的善行义举；甚至对邪恶的右半身来说，善子爵都充满了同情和怜悯：“这就是做半个人的好处：理解世界上每个人由于自我不完整而感到的痛苦，理解每一事物由于自身不完全而形成的缺陷。……我现在怀有我从前完整时所不曾体验过的仁爱之心：对世界上的一切残缺不全和不足都报以同情。”^{[5]62} 人们觉得这位好人似乎从天而降，面带温和的微笑，来拯救困苦和灾难。善子爵的言行颇有些基督传教时的色彩，但不一样的是：耶稣出来传道，宣讲天国的福音，劝人悔改，远离恶行。他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在民众中得到极大的回应。然而善子爵时而庄严古板，时而疯癫迂腐，人们没有在他的善行中感到上帝“至善”精神的召唤，却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善子爵向胡格诺教徒提出施舍穷人、降低裸麦价格的要求，却并不尊重他们勤劳节俭的生活方式。他常去暗查胡格诺教徒的粮仓，“指责粮价太高，并且四处张扬，破坏他们的生意”^{[5]78}，使得“胡格诺教徒们现在轮流站岗放哨”^{[5]78}，只为提防他。在布拉托丰阁，善子爵对

麻风病人宣传道德规范时总是说教、愤慨、责备、教训，让他们心生烦躁。布拉托丰阁的麻风病人不再抚弄乐器，不再歌唱，哭泣与绝望代替了以前的狂欢与放纵，只能在无法排遣的痛苦中渡过漫长的夜晚。于是，布拉托丰阁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话：“在这两个半边之中，好人比恶人更糟。”^{[5]78}

我们在对比欧洲近代的基督教文学中可以发现这样的变化：同为借鉴圣经中善恶二元模式的作品，例如《浮士德》，“上帝与魔鬼、浮士德与魔鬼、浮士德的内心都呈现出了善恶冲突而又统一的状态”^{[9]209}，并且善必战胜恶，上帝必战胜魔鬼，最终浮士德获得了上帝永恒之爱的救赎。而在现代派作家卡尔维诺的笔下，基督教“至善”的精神发生了流失，善行义举也变成了邪恶的帮凶。这暗示着自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社会中基督教的善恶价值观发生了变异，人们无法从主的美善中获得精神慰藉与灵魂救赎。

三、重归完整——古老和谐状态的追寻

善恶对决让梅达尔多获得了新的生命，重新复归为完整的人。叙述者“我”置身于完整一致的热情中，却越来越觉得少了点什么，为此而感到悲哀。卡尔维诺曾说：“开篇时完整的梅达尔多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梅达尔多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梅达尔多。”^{[5]96} 这样的结尾带着淡淡的哀愁，让人怅然若失。我们不禁开始思考：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美好情感的践踏，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带来的异化——如同梅达尔多子爵在战争与虚无的社会中受到的戕害，人们无法承受而导致内心的分裂。西方世界开始走在与上帝若即若离的路上，但人们仍然渴望挣脱虚无的桎梏，回归心灵的纯净与灵魂的救赎。

正如这位复归完整的子爵，虽然善恶具备，却不好不坏，他既让人一无所知，也不足以使全世界变得完整。卡尔维诺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但他也痛斥毫无意义、愚蠢的“完整”。他在《我们的祖先》的“后记”中谈道：“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自我敌对；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和谐的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这就是我有意置放于故事中的思想——道德核心。”^{[5]94} 尽管卡尔维诺强调个

① 见路加福音：3：22

人在自我抉择上的矢志不移,但这种“新的完整”最终要达到的是“非个人主义的完整”。因而在这个冰冷的技术时代,“新的完整”不仅是对西方现代人的存在之思,更是对古老和谐状态的呼吁与期盼。

卡尔维诺关注善恶二元的探讨,实则暗含了基督教价值体系中的道德内涵。基督教传入欧洲大陆并被奉为国教后,教会运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二元理论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创立了上帝与人、天堂与地狱、灵与肉、善与恶等二元化思想。这些思想内涵对西方文化传统与价值观的塑造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确立了西方世界的基本思维模式。在早期基督教的二元对立学说中,上帝的权威与信仰的力量被放在了首要位置,也更强调“上帝与人的对立”,然而随着西方对“人”的日趋重视,基督教二元对立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人自身中的善与恶、情欲与理性等新的内涵。^{[10]156}

在《圣经·创世纪》一章中,夏娃受到蛇的引诱,与亚当一起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被赶出了伊甸园。值得注意的是,蛇是以知善恶来引诱夏娃的,蛇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①而在得知亚当与夏娃知善恶后,上帝遂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②可见知善恶在这段先民的历史中是何等重要!人类的祖先虽然犯下原罪,但是在上帝的价值体系中,知善恶是神性的体现,人知善恶才能更加接近神性。^③善良与邪恶就如同上帝所造的世间万物,有光明,必有黑暗;有善,也必有恶。善恶子爵只有二元共生共存、对立统一、复归完整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这也是基督教文化的价值取向。而在这种追寻和谐的意义中,需要闪烁着上帝“知善恶”的光辉,才可以洗去虚无、愚蠢的完整,达致真正的“人的完整”。

尽管《分成两半的子爵》展现了西方现代社会荒诞虚无、信仰缺失的景象,但卡尔维诺没有被动地接受消极的现实,他在文字中注入活力,保持积极的乐观主义。整本小说并非灰暗悲伤的色调,而是在明快欢畅、简达轻逸的语言中展现了对“古老和谐的状态”的追寻。正如刘建军在《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中这样评价卡尔维诺的作品:“不

仅在思想价值的选择上,当代作家甚至在艺术上也做出了寻找各种要素之间和谐关系的努力。……表现了各种关系必须和谐相处才能出现意义的思想。新的文学思维模式是以个体为出发点,再其所处的特定关系中来寻找人类共有的看待人自身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模式——寻找既保证个体自由的充分实现同时又能够与他者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从而导致人类在一个共有价值意义上的真正达成,也就成为了今天文学活动的根本目标。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文学思想已经与基督教文化精神开始合流。”^{[10]321-324}诚如刘建军所说,我们从卡尔维诺的小说中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对理想、完美、和谐世界的向往,而不是“美好、智慧、正义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5]40}的半个人的哲学,这正是试图解决现代人信仰困境的一种出路,也是卡尔维诺积极乐观的内心写照。

四、结 语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传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塑造了西方文明,影响着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式,还融入了西方文学精神的发展脉络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无论在西方思想界与文学界如何看待基督教传统,基督教文化都以潜意识的方式根植于西方人的头脑中,汇聚成西方作家灵感的源泉。《分成两半的子爵》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经典之作,他从基督教的历史典故中获得灵感,用寓言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了善恶二元分裂斗争的故事。小说有着丰富的哲理意蕴,展现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基督教道德观与价值取向的日渐衰落,人们无法从宗教中获得慰藉与救赎,陷入了迷惘绝望的精神危机之中。虽然小说呈现出对宗教衰落的怅然所失,但卡尔维诺仍然怀抱着追寻和谐美好的信念,这不仅是现代文学对基督教价值取向的回归,也是卡尔维诺通过文学寻找现代人精神出路的终极关怀。小说始终闪现着基督教神圣的光辉,给予人们智慧的启迪与精神的指引。

[参 考 文 献]

- [1] 侯丽华. 翻译家眼中的卡尔维诺[J]. 深圳商报(新潮阅读), 2001(10): B03.

① 见创世纪:3:5

② 见创世纪:3:22

③ 但人不能再摘生命树的果子,那将逾越神性与人性,超越人的有限走向神的无限。

- [2] 特雷·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3]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 下[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 [4]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5] 卡尔维诺. 分成两半的子爵[M]. 吴正仪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6] Matthew Arnold. Poetical Works of Matthew Arnold [M]. Macmillan and Co. & New York, 1891.
- [7] Terry Eagleton. 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8] 诺斯诺普·弗莱. 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9] 梁工. 基督教文学[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 [10] 刘建军.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程晓芝)

Analyzing the Belief Dilemma from The Cloven Viscount

GAO Rui-yi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loven Viscount is a classic novel written by Italian writer Italo Calvino. The novel is based on historical allusions of religious wars, and shows spirituous crisis of modern society in the form of fable after the failure of western religion. This novel applies Nietzsche and Eagleton's discourse on western religions, and tries to find th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of Calvino in theological thought so as to explore the solution of the "split" of modern people. The cloven viscount implies an art deformation of the Christian's idea of "good and evil"; the pursuit of "integrity" is a signal of returning to the ancient value system of harmony. This is a modern writer's philosophy thought for dilemma of belief, as well as Italo Calvino's leading of the westerners' spiritual world.

Key words: Italo Calvino; The Cloven Viscount; Belief Dilemma

(上接第 101 页)

New Manifestations of "Street" in Shanghai-Style Novels in 1930-1940 s

XIAO Pei-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40s Shanghai was well-known as the "Oriental Paris",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 typical modern metropolis, and almost a symbol of modern China. Therefore, "street" in Shanghai-style novels also has new manifestation. Shanghai style novel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highlight more prominent modern city char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cession culture,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ld in the new" —— an ukiyoye of shanghai street with the western charm.

Key words: "Street"; Shanghai-Style Novels; Manifestations